



邵宇谈后工业社会的变革



意见领袖 |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2021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周年。第一个十年，在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双重利好之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GDP 总量逐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十年，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全球化面临调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约束，曾经的驱动力转变为未来增长的阻力，增速逐步放缓。挖掘中国经济新动能成为新议题。

自 2016 年英国脱欧以来，“二战后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已有高度共识。政治意志似乎是每个阶段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但从 500 年全球历史来看，技术和创新才是塑造全球化的终极力量。它不仅划定了贸易的边界，而且还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历史终结论

颇有市场，但一再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和技术演化的方向来看，服务业或将整体上从“不可贸易部门”转变为“可贸易部门”，其在提升制造业比较优势当中也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比较劣势是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的未能充分发挥的重要解释，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制造“走出去”难题上。笔者认为，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上看，服务业开放的滞后是中国服务业比较劣势的一个重要解释，尤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自 2019 年 7 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简称“金融开放 11 条”）以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显著加快，这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and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都有直接意义。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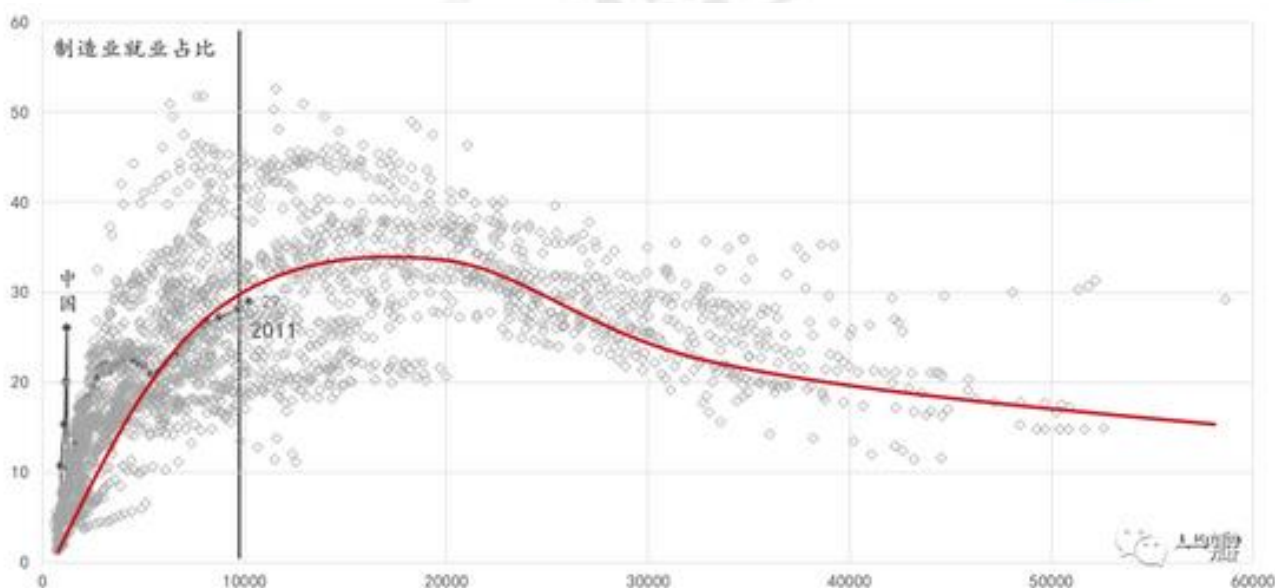
在发表于 1940 年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一书中，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 (C. Clark) 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它们分别对应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是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和需求侧消费偏好升级的自然结果 (张斌, 2021)。

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早在 1973 就极具预见性地阐述了“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的概念，并列举了其具体表现：(1) 经济方面，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2) 职业上专业和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3) 理论知识是社会变革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 科学技术的重

要性显著提升；(5) 智能技术在制定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工业时代。由于知识和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非熟练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会更加凸显，分配和公平问题将成为长期难题。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转型实践基本符合贝尔的论述。

从国际经验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的拐点集中在人均 GDP 为 8,000-9,000 国际元所在的年份（图 1）。以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下行为标志，20 世纪 50 年代末，加拿大、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服务业转型。东亚经济体中，日本的拐点出现在 1970 年，韩国出现在 1992 年。中国的拐点大约出现在 2011 年，当年中国人均 GDP 为 9,700 元。截止到 2019 年底，服务业增加值占中国 GDP 的比达到了 63.5%，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为 47.1%。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这与因为农业就业占比明显偏高相对应。

图 1：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制造业服务化 (Servic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概念在帮助人们理解某些现象的同时，也在掩盖另一些现象。某种意义上，三大产业是一组相对过时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已经深度融合。大量传统的制造型企业也生产服务，一些公司还可能决定专注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因为，根据“微笑曲线”，上游专利技术和下游的品牌等环节的附加值都高于中游的制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IBM，它已经迅速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彻底改变了商业模式，这是其能够保持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在 IBM 的总销售额中，服务的份额约为 60%。类似的案例还有传统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它正在转型成为汽车服务商。随着数字时代的加速推进，制造与服务的融合还将进一步深化。这就是 21 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制造服务化”的趋势。

制造服务化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将越来越依赖于服务，既可能是制成品的中间投入，也可能是生产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有可能作为与商品捆绑销售的产出。制造业企业内部的这种服务增加了产业分类统计上的难度。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基于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制造业内部与服务活动相关的岗位情况。Miroudot et al. (2017) 分析了 OECD 国家的数据，发现制造企业中约有 25%到 60%的就业岗位属于服务支持职能部门，如研发 (R&D)、工程、运输、物流、分销、营销、销售、售后服务、IT、管理和后台支持等。

分行业而言，化学制品和汽车等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38.4%。焦炭和石油的价格较低 (25.9%)，但几乎所有行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都在 30%以上。在服务业增加值中，分销环节占比三分之一左右，与商业服务（包括电信、计算机服务、专业服务、研发、咨询、广告和营销、技术测试以及环境服务）相当。另外三分之一分为交通、金融和其他服务（这一类别包括建筑、酒店和餐厅、政府服务、卫生和教育、娱乐和视听服务）。当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基本特征是：（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制造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占比越高；（2）在纺织和服装、木材或非金属矿物等传统低技术制造业部门中，核心制造岗位的就业占比较大，ICT 等高科技产业拥有更多的配套服务。

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事实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这也是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现象与信息通信技术 (ICT) 的发展有关。所

以，卡斯特尔（M. Castells）在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提出，信息时代的产业划分应该是农业、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经济学界之所以常常忽视产品生产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部分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长期无视它们的异质性，遑论服务业内部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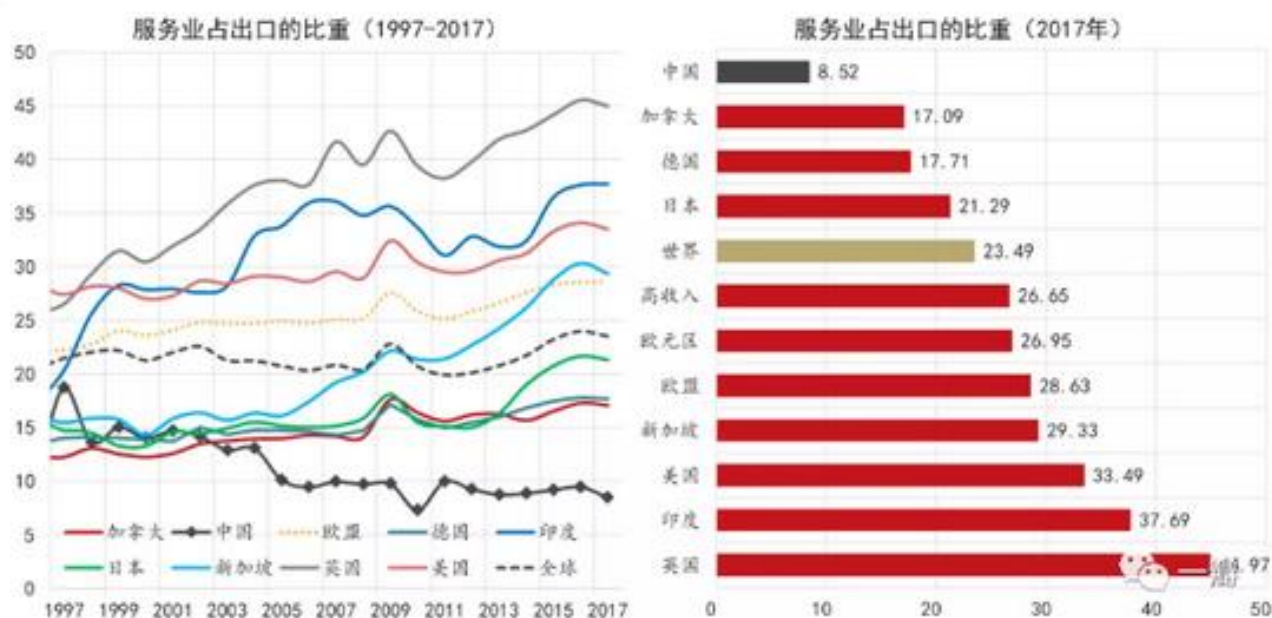
所以，当我们在借用一些概念或理论来表达某一事实的时候，也需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是随着“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变化而显现出来。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的价值将有更充分的体现。服务业很可能不再被视为低生产率的行业。服务是商业社会生态系统和制造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客户、合作伙伴和承包商的合作是创新和生产力的关键。此外，服务还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扩展的推动者，既作为一种“产品”或“中间品”参与交易，也是生产活动的重要辅助。

服务业全球化

经济数据的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在服务业占各国 GDP 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的提升却显著滞后。截止到 2019 年，在 OECD 国家当中，服务业占 GDP 的约 75%和就业的 80%左右，但在贸易中，服务贸易的份额仅为 15%。就全球而言，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3.5%。无论是从全球还是分各国的出口当中，服务的占比也显著偏低，OECD 为 26.7%，全球为 23.5%。以 2017 年数据为例，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英国的服务业出口占比为 45%，美国为 34%，中国不足 10%（图

2)。另一个反差是，中国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但同时存在规模不小的服务业逆差，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但却有着可观的服务贸易盈余。如果向服务经济的转型的同时，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也得以加强，那么制造业时代的比较优势的对比将得到扭转。

图 2：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比显著偏低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服务业的“不可贸易性”部分属实，但这种反差也是一种统计上的错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0094

